

“吏不廉平，则治道衰”，出自东汉班固《汉书·宣帝纪》，语出汉宣帝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秋天颁布的诏书，意思是：官吏如果不清廉公正，国家治理形势就会衰败。

汉宣帝刘询是西汉第十位皇帝，幼年遭遇“巫蛊之祸”，长期避难民间，这也使得他对百姓疾苦和吏治得失体察深刻。待其亲政以后，开始大刀阔斧整饬吏治，尤其早期他注重加强官吏的考核与奖惩制度建设，惩治贪腐，赏罚分明，多次下诏称“有功不赏，有罪不课，虽唐虞犹不能化天下。”“鰥、寡、孤、独、高年、贫困之民，朕所怜也。”革新吏治、体恤民生的形象跃然纸上，一时政治清明、社会和谐、经济繁荣、四夷宾服。《汉书·循吏传》记载称：“是故汉世良吏，于是为盛，称中兴焉。”

为什么“吏不廉平，则治道衰”？表面看是治理结构中的上行下效问题。“吏者，官者，管也。”作为管理者，官吏总处于国家治理层级结构中的一环，上层官吏贪污腐败，胡作非为，下层官吏队伍必然有样学样、污浊不堪，整个社会风气也必然江河日下，正如南北朝时期著名学者何承天在《上邪篇》中说的“上邪下难正，众枉不可矫”，意思是在上位的人走邪道，下面的人就很难走正道，等到众人都歪斜不正成了气候，想纠正就不行了。但更深层原因在于吏治腐败会直接削弱政权的合法性。权力的本质在于资源分配，贪污腐败往往意味着权力的公器私用和滥用寻租，至小会加剧社会不公和贫富差距的扩大，经济发展受阻，至大则往往导致公众普遍对政府产生不信任感，继而政策难以推行和行政效力低缓互为因果，长此以往必将严重破坏国家治理通畅和社会秩序稳定。

“吏不廉平，则治道衰”之所以经典，就在于其将吏治是否清明与国家命运兴衰联结在一起，清醒地认识到，巩固政权，谋求长治久安，需要有一支清廉能干的官吏队伍。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告诫全党，吏治腐败是我国历代王朝走向衰亡覆灭的一个重要原因，清正廉洁从来不只是个人修为，而是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兴衰存亡的大问题。古往今来，治国必先治吏，拥有一支作风清廉、能力高效的吏治队伍，从来都是国家兴旺发达、政通人和的关键。

名谓治国，实为治吏 《左传》有句名言：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公元前710年，宋国的太宰华督称兵作乱，为得到各国承认，宋国便四处行贿，鲁桓公也接受了贿赂“郟大鼎”，公然置之于太庙。鲁国大夫臧哀伯见此，进谏称：“君人者，将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犹惧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孙……百官于是乎戒惧，而不敢易纪律。”并就此大鼎一事正指出：“今天德立违，而置其赂器以太庙，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诛焉？”结合起来理解就是，作为国君必须尽力崇尚道德而坚拒一切邪恶行为，以此统治臣民，使之有所戒惧而不敢违反纪律。如果为上不端而百官群起效尤，该如何惩处他们呢？臧哀伯接着说出了一句千古名言：“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都鄙在庙，章孰甚焉？”官员之邪恶，必然导致国家之败亡，堂而皇之接受贿赂，也就丧失了为官之德。臧哀伯这一断言，显然是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成为我国政治史上闪烁着智慧之光的客观真理，并滋养后人，成为反对贪污腐败、保持为政清廉的警醒和箴言。

廉者，政之本也。翻开卷帙浩繁的历史长

# 吏不廉平，则治道衰

□ 强文哲



卷，注重操守、廉洁为公的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清廉文化涵盖了从官员选拔、考核、惩治、教化等多个方面，汗青轴卷中也留下了脍炙人口的清廉吏治篇章。早在西周时期，《周礼》就提出对官员的考核标准：“以听官府之六计，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这就是著名的“六廉”说，其中又把“廉”置于评价官吏的首要标准。春秋战国时期，管子把“礼义廉耻”视为“国有四维”，齐国大夫晏婴提出“廉者，政之本也”的思想，鲁国大夫臧文仲更尖锐指出：“宋其兴乎。禹、汤罪已，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其兴也勃、其亡也忽。”成为廉政与王朝兴亡周期关系的千古命题。汉代首次设置举孝廉科，依廉选贤任能，倡导“量材而授官，量能而定位；则廉耻殊路，廉不肖异处”的用人思想。东汉学者王逸在《楚辞·章句》中将廉洁定义为：“不受曰廉，不污曰洁。”唐太宗李世民训诫臣僚：“且为主贪，必丧其国；为臣贪，必亡其身。”丞相魏征在《群书治要》中也说：“为政者，莫善于清其吏也。”在他看来，政权治理最重要莫过于推动吏治清廉。唐武宗李炎在位虽只有短短六年，但其大刀阔斧反腐肃贪整顿吏治的措施却不容忽视，比如首创严禁官员借婚丧嫁娶大肆敛财，首创高薪养廉（后来被清朝雍正发展为“养廉银”），禁止官员从事高利贷和典当行业等等，被后世誉为“会昌中兴”。清代康熙推崇“源清流洁”吏治思想，认为“崇尚清节乃国家为治之要务”，并采取选任高官以操守为先、严惩贪官、优遇清官等措施整饬吏治，成为封建专制社会的一股清流，值得今人沉思和借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研究我国反腐倡廉历史，了解我国古代廉政文化，考察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的成败得失，可以给人以深刻启迪，有利于我们运用历史智慧推进反腐倡廉建设。”透过历史风烟，历代王朝的兴衰更迭、往复循环悠长浮沉，或许每一个王朝的治乱变迁背景原因各异，但始终没有逃出“廉则兴、贪则衰”“官廉则政举，官贪则政危”的定律。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今天我们回首历史，就是要以史为鉴，深入发掘中华传统吏治文化的当代价值，汲取清正廉洁的宝贵养分，以此增强忧患意识，涵养克己奉公、清廉自守的精神境界。

## 吏治清廉是党的光荣传统、鲜明特点和独特优势

中国共产党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清廉政治基因，自诞生之日起，就把吏治清廉、反对贪污腐败深植自身肌体之中，融入共产党人价值观，贯穿党的各个历史时期。正如毛泽东同志深刻指出：“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如果国下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国家就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

党的一大纲领仅15条约700字，其中“纪律”专章占到整部党章篇幅的近三分之一。党的二

大党章，明确规定统一经费管理、对党组织的财政情况进行监督，凸显对财经和廉洁纪律的重视。1926年8月，中共中央发布党史上第一份反腐文件《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1927年7月，党的五大选举产生中央监察委员会，第一次专门设置监察机构开展党内监督和反腐败倡廉。1931年5月，《中央巡视条例》颁布施行，正式建立党内巡视制度；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一建立，就对官僚主义、贪污浪费等腐败问题展开坚决斗争，发表《反对浪费严惩贪污》，专门强调“对于一切浪费经济，特别是贪污分子，都要给以严厉的惩罚”。1933年12月，中共中央又发布党史上第一个反腐败法令《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二十六号训令》。以上种种，反映的就是我们党在幼年时期就对吏治腐败的严厉拒绝和高度警惕。

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高扬反腐倡廉大旗，坚持吏治从严，尤其严惩党员干部贪污行为不手软。《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明确规定：“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并先后出台《陕甘宁边区政府惩治贪污暂行条例》《晋察冀边区惩治贪污条例》等多个惩治贪污法令，引领反腐倡廉工作走上法治轨道。特别是党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坚持通过铁的纪律，严的规矩厉行廉洁政治，仅1937年至1941年间，就查处各类贪污案件235件，其中就包括因贪腐被判处死刑的老革命功臣肖玉璧，强调“在‘廉洁政治’的层面上，不容许有一个‘肖玉璧’式的莠草生长！有了，就拔掉它！”以其强大的震慑警示作用，有效遏制了腐败滋生蔓延态势，边区政府成为清廉吏治模范区。1951年11月，毛泽东在批转华北

局关于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调查处理情况的报告时强调：“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绝不容忍利用执政地位牟取特权私利的坚决态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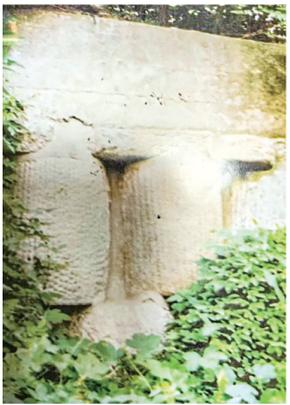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勇气，以“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的使命担当，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反腐败斗争。截至2024年7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近十年间共立案审查调查438.8万件、470.9万人，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72.3万起，给予党纪政务处分64.4万人。查处贪官之多、涉及领域之广、行动密度之大、问责力度之强，彰显的是新时代党中央对“吏不廉平，则治道衰”的始终清醒和坚定不移反对腐败的政治决心。

成其身而天下成，治其身而天下治。放眼人类政治文明史，没有一个政党像中国共产党一样，持续百年进行党性党风党纪建设。回望来路，从“窑洞对”到“坚持自我革命”，从“两个务必”到“三个务必”，从“反腐倡廉建设”到“全面从严治党”，中国共产党始终以“赶考”的清醒，将从严治吏、永葆清廉作为赓续辉煌的制胜法宝，党的发展史不仅是一部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辉煌奋斗史，也是一部矢志不渝同吏治腐败现象作坚决斗争的伟大自我革命史。

## “吏不廉平，则治道衰”之深刻启示

鉴古知今，继往开来。历史反复昭示，吏治关系政治得失，民心向背、治乱兴衰，治国必先治吏、治吏务必从严。梳理总结清廉吏治的传承沿革和实践经验，对进一步增强干部监督

## 寻访洋河碌碡桥



洋河碌碡桥遗址(董学武2004年摄)。

## 往事

一个偶然的机会，在渭南潼关河南街村农民画家王云的画室里，看到烙画《洋水碌碡桥》，我深深地被触动了。烙画，也叫火笔画，是中国传统艺术珍品，有一种古朴典雅的特殊魅力，艺术感染力很强。画上的桥雄伟壮观，桥墩是用碌碡垒起来的，桥头的牌坊上有两个大字“洋桥”，两边有一副对联“东去函谷无二路，西出阳关第一桥”，桥上有骑马的、坐轿的、推车的、挑担的，景象一派繁忙。王云介绍说，这座桥是古代从长安城出来、西去的唯一一座桥。始建于明永乐十二年(1414)，明弘治五年(1492)重修，宽两丈余，至光绪八年(1882)改为石柱桥。民国二十四年(1935)西兰公路初通时，洋河桥是西兰公路陕西段上最大的桥梁，该桥为石台木梁桥，俗称碌碡桥，也叫三里桥，全长129米，桥面宽4.5米。听老年人说，这座碌碡桥是清末文家村举人吴步瀛先生倡导和修建的。开始吴举人差人到处张贴布告，宣传大量收购碌碡，一斤一两银子。有人认为是个发财的好机会，就把周围各县，甚至把甘肃、宁夏的碌碡都搜集运来了。可碌碡这么重，哪有这么大的秤称？文举人就命人做了一杆大秤，用几个碌碡作秤砣，大槌作秤杆，用锯在秤杆上拉几下就是秤星，试想，你的碌碡能称几斤？算盘一响，连吃饭、住店的钱都不够，不卖可咋办？运回去还得花更多钱，只好贱卖了。这

## 人物

# 左宗棠咸阳访贤问能



左宗棠在陕甘总督任上的素描像。

清同治年间，陕甘总督左宗棠率军西征，为尽快恢复西北社会秩序，他沿途访贤问能，结交各地名流贤士，以期纳入麾下，为他经略西北效力。左宗棠进入陕西，驻节长安后，寻访关中诸府县贤士干吏，在咸阳的泾阳、长武、兴平等地皆有关于左宗棠访谈的记载，他折节下士、寻贤访能，有不少传闻趣谈流传于世。

在泾阳拜谒恩师 泾阳，是左宗棠座师徐法绩的家乡。他早年在湖南乡试举人时，曾得到当时的湖南乡试主考官徐法绩的慧眼识珠，从而得以脱颖而出，经恩科补录取得举人功名。左宗棠便借此机会拜谒恩师，以报当年的知遇之恩。

徐法绩(1790—1837年)，字定夫，号颐庵，陕西泾阳县土门徐村人，进士，任翰林院编修、御史等职。道光年间，徐法绩奉旨赴湖南主持乡试，这次乡试恰逢道光皇帝五十寿诞，于是朝廷令各地搜罗“遗卷”，即按例恩科可在已落选试卷中再选拔补录若干名额。因副考官胡某近于任上，遂由徐法绩主持补录工作。经过反复查看，徐法绩最终选定补录六名，其中补录的第一名即左宗棠，文章题目是《选士厉兵简练俊杰任任有功》。

但就在这个时候，徐法绩让同考官按程序补录时，却未获同意，同考官地位仅次于正副考官。该考官对徐法绩说：中不中由你，荐不荐由我，你想让左宗棠中就中，但是想让我更改批语则万不可行。就是对左宗棠试卷上的“欠通顺”批语不做更改，双方意见不合，使左宗棠的补录程序难以推进，陷入僵局。见此情形，徐法绩据理力争，强调他是奉旨为国抡才，并非徇私情，坚持补录左宗棠，其他考官见状从中婉劝疏通，该考官这才勉强将批语改为“尚通顺”，左宗棠也由此得以成功入选。

左宗棠深感座师推荐之恩，于是便来到泾阳拜谒。但此时徐法绩已逝世三十余年，左宗棠悲痛万分，泣不成声，随后便为恩师购田修莹，修建牌楼和种植柏树，设专人守护墓家，还亲自撰写碑文。左宗棠在碑文中回顾了当年搜罗“遗卷”之事，以示深切缅怀这份深厚恩情。同时，他还寻访徐法绩后人，得知徐法绩长子徐正谊已亡，便将徐法绩长孙徐韦佩带在身边关照，随军出征。

在泾阳时，左宗棠还应邀为味经书院题写门联，该门联笔迹潇洒秀丽，曾悬挂于书院礼堂前。味经书院，也称泾阳味经书院或陕甘味经书

管理质效、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吏治廉平，首在教育引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欲事立，须是心立。’加强思想教育，是党内政治生活的首要任务，是保证全党步调一致的前提。”中国传统政治文明的一大特点，就是注重“德教为先、修身为本”，认为思想道德教化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和作用，是实现吏治清廉的重要手段，执政者本身也肩负着教育官员清正廉洁、引导社会向好向善的责任。如《论语·论政》云：“举善而教，不能则劝”，意思是说举用德行良好的贤人去教化那些才能欠缺的人，民众就会相互劝勉，社会风气才能贤思齐。《孟子·尽心下》又云：“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好的政令不如好的教育更容易赢得民心。理想信念不会凭空产生，也不可能轻而易举坚守。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始终将理想信念教育作为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要举措，践行“掌握思想教育是我们第一等的业务”。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部署开展的一系列党内集中教育，本质都是希望通过学习勤扫思想信仰之“灰尘污垢”，以“内无妄思”保证“外无妄动”，实现吏治清廉的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吏治廉平，重在奖惩并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坚持‘三个区分开来’，更好激发广大党员干部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严管是惩、厚爱即奖。看似存在矛盾，但本质上属于方法对立、目的相同的辩证统一，最终目的都是帮助管理者行为端正。古人讲“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国家大事，惟赏与罚。”强调的就是宽严相济、赏罚分明。延安时期，肖玉璧是受到特别关心照顾的革命功臣，毛泽东曾两次走进窑洞和医院探望他，甚至看到肖玉璧身体状况虚弱后，毛泽东不顾身体消瘦，也坚持把中央特批给他的每天半斤牛奶分给肖玉璧。但后来肖玉璧因贪污受贿、克扣公款被边区高等法院判处死刑时，毛泽东却坚决支持法院判决，对贪污腐败毫不姑息。实际上，任何管理者都不可能生活在真空中，都有七情六欲，这就要求在吏治过程中不可偏废赏与惩，既通过严格教育管理监督，促使干部勤政廉政，不偏离正道、不走邪路歪道，又要在政治思想工作生活上注重激励褒奖，给予真诚关爱，鼓励干部积极主动干事创业，做到当严则严、当宽则宽，实现人心齐聚、吏治清廉。

吏治廉平，根在制度完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小智治事，中智治人，大智立法。治理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关键是要立规矩、讲规矩、守规矩。法律是治国理政最大最重要的规矩。”纵观历史，各个吏治文明的朝代无不将立法建制视为治国之要务、理政之圭臬，通过建立清廉管理、廉政监督防范和违纪惩戒等制度，堵住不良风气侵蚀的漏洞。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以八项规定起步，先后领导制定修订多部法律，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完善多项党内制度条例准则，目的就是补齐制度规则短板，推动反腐败治吏制度化、规范化，以良法保障善治。好制度更在执行。明代张居正讲“天下之事，难于立法，而难于必行”，意思是，天下之事，制定法令不难，难的是对法令的贯彻执行。故此，全面从严治党，实现吏治清廉，完善制度规则固然重要，但更关键的是要行之有效地付诸实践，把“纸上的法律”变为“行动中的法律”。

物与性格耿直，多年未有升迁，同时又因他自命清高，不善应酬，久为同僚所不容，有“尚杠子”之称，后辞官归乡，赋闲在家。

左宗棠听闻长武竟然有位进士，不免惊喜万分，遂慕名前往拜访。他们初次见面，尚林焱说：“闻外唯有将军来。”左宗棠答道：“此地还是先生高。”彼此相见恨晚，畅谈许久。面对左宗棠的盛意相邀，尚林焱欣然应邀，成为左宗棠的幕僚，但这样的日子没过多久，尚林焱就因恃才傲物、自命清高，接连当众给左宗棠难堪。他言语间常暗讽左宗棠的“搜房举人”身份，同时还有意无意地强调自己进士身份。受到尚林焱连续多次当众羞辱后，左宗棠恼羞成怒，以年事已高、气候不宜为借口辞退了尚林焱。

## 在兴平“为读书人下车”

除了寻访关中德高望重的学者外，政声较好的县府官员也在左宗棠的访贤问能范围内。左宗棠在获知兴平县令王权学问高、政声好后，顿生爱才惜才之心，便牢记于心。不久，当左宗棠的车队经过兴平县时，他接见了这位声名远播的县令王权。看着左宗棠率平官吏和士绅名流跪迎他的县令王权时，左宗棠扶起跪地的王权说道：“足下陇右读书人也，宰相不为知县下车，我为读书人下车。”

王权(1822—1905年)，字心如，号笠云，甘肃肃州府伏羌县人，生于耕读世家，举人，但因会试多次落第，遂无意仕途，前往甘肃天水陇南一带讲学教书。王权道德文章俱佳，有“关西孔子”“陇右诗圣”之赞誉，后任陕西西乡县令，所到之处，政绩卓著。左宗棠见到时任兴平县令的王权非常高兴，对这次会见也甚为满意，他深为王权的学问和才干所折服，曾给予王权高度评价：“伏羌王权，学问人品当代罕有，吏治尤为陕甘第一。”左宗棠到达甘肅后，为了尽快恢复被战火蹂躏摧残的文教事业，遂大力兴办书院兴学，曾力邀王权出任甘肃最大的省立书院——兰山书院的山长，但是这时的王权还在陕西的县令任上，故未能赴任就职，对此左宗棠在给陕西学政吴晋卿的信上无遗憾地说：“陇人惟王权喜读书，行谊亦卓，前曾延主兰山讲，旋以其权兼中令，不果来。”

有关左宗棠在咸阳的故事散记于各地志书中，除了他与咸阳各地读书人的交往故事外，还有以他命名的陕西与新疆绵延千里的“左公柳”，左宗棠与泾阳伏羲，以及左宗棠行军途经长武扩修车道等故事。 □任耀博